

湖
南

文
史

HUNAN WENSHI

44

1991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第
44
辑

湖南文史

周谷城题

湖南文史杂志社

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4辑

编辑/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主编/田伏隆

副主编/丁江 高原

责任编辑/朴永子

出版/湖南文史杂志社(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15号)

发行/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

印刷/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

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

开本/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7.5 字数180,000 印数12,000
版次/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长沙第1次印刷

国内统一刊号 CN43—1175 定价/3.00元

目 录

(总第44辑)

往 事 钩 沉

- 一个军统勤杂人员的回忆 谭正龙 (1)
叶挺在重庆歌乐山的囚禁生活——诱捕土匪卢麻——重
庆大隧道窒息事件——戴笠生活点滴——独特的“明正典
刑”——巡官与扒手——周佛海等人在“白公馆”

- 随程潜庐山之行琐记 戴梦年 (13)
“奉召”上山——路遇马歇尔——在王陵基的宴会上——
“官邸”会议侧闻——记者招待会——中秋晚会——程潜
与李明灏的一席谈

烽 火 忆 往

- 粤汉铁路破坏队第二中队在临湘的抗日斗争 伍远发 (26)
青山惨案 黄跃文 伏凤章 冯新华 沈春生 (31)
蓝天勇士龚业悌 李源汉 (36)

替元平日寇 热血洒疆场 周江伯 (42)

磨剑都梁道——血战天马城——伤愈出院——远征途中
——在缅见闻——跨渡怒江——与死神搏斗——回师昆明
明——在作战人员研究班里——庆祝抗战胜利在昆明

三 湘 史 华

湖南“南学会”邵阳分会活动始末 陈新宪 (59)

记湖南女权运动的先驱唐群英 唐世凡 (69)

工 商 经 济 史 料

爱国的工商业者南解皇 李德聪 (74)

军 事 史 料

自民国初年至解放时邵阳市所经历的战争 谭涤予 (81)

第一次南北战争——第二次南北战争——谭赵之争——第三
师与第四师的争斗——北伐战争——陈光中匪部偷袭宝庆
——西征之役——蒋、桂战争波及邵阳——市区首遭空袭
——日寇侵犯邵阳——邵阳驻军起义——迎接解放

剿 匪 史 话

记桂东歼匪始末 胡济石 (94)

回 顾 湖 南 解 放

- 常德地区迎解工作的片断回忆 胡开材(104)
雷孟炎部队起义始末 陈新民(113)
 当时形势——临武起义——蓝山响应——新田聚义——部队
 成长——接受改编——结果与善后
- 安化东坪“二·八”惨案始末 林必荣(129)

湘 翡 文 化 名 人

- 回忆我的母亲袁昌英教授 杨静远(143)
 扎实实装了一肚子学问——走上教授、学者、作者的道路
 ——珈珞山上——八年抗战岁月——晚年
- 怀念邓公先老师 李人俊(157)
- 蜚声国际的佛学家陈健民先生 陈浩望(170)

民 族 史 料

- 土家族大摆手歌舞活动 王本亮(177)

大摆手歌舞的沿革——大摆手堂的设置——大摆手歌舞的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——大摆手歌舞的内容和摆手形式——大摆手歌舞的曲扣历史

海 外 之 窗

海外生活四十年 王賜生(185)

建 国 后 史 料

娄邵铁路修建工程纪实 马少侨(202)

娄邵铁路修建工程指挥部——下达《开工令》——三个高工效评比竞赛高潮——三次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——大战月光山

忆省祁剧艺术代表团赴京汇报演出及赴天津等地

艺术交流的盛况 朱 诚(219)
名角云集 精英荟萃——选定剧目 确定主演——上北京
进怀仁堂——民族文化官见到了周总理——天津的小百花
——济南见到了京剧“裘派”——徐州会见了老调剧团
——在南京为将军们演出

回忆平江金龙区的土改斗争 刘国权 姜甫生(232)

一个军统勤杂人员的回忆

谭正龙*

叶挺在重庆歌乐山的囚禁生活

1943年秋末的时候，有一天，被服股长裴耀庭叫我拿一套青呢料的中山装去重庆歌乐山蒋家院子，送给一位新来的先生（军统称一般大官为“先生”）。

蒋家院子是一栋四合院的平房，座落在歌乐山朝嘉陵江一面的半山腰、军统公墓的下首和总务处管理科的库房附近。院子外面是青石的磴道，有内政部警察总队的警察站岗。围墙进门的一间房子住着四个警卫（看守），右侧一栋三间，是厨房、厨师住室、浴室和厕所。左边一栋三间，住着勤务兵和女佣人。正面一栋一连三间，进门左手边一间空着，堂屋中间摆着一张乒乓球台子，靠墙边摆了几把沙发式藤椅，靠右手边一间，室内摆了一张弹簧床，几把藤椅，一张桌子。新来的先生就住在这间房子里。

这位先生中等身材，蓄着浅平头，五十上下的年纪，穿一套青斜纹布的中山装。我把呢料衣服送上，他说：“这种料子的衣服我不要，你们有没有棉衣服？”我赶紧跑回去告诉裴耀庭，裴又打电话请示沈醉，当天下午就在库房选了一套青斜纹布的二号棉衣裤送去。他说：“小鬼，这个蛮好呀，你们还有不有衬衫？”态度顶和气的，一点大官架子也没有。我试问了一句：“您是广东人吧？”他笑笑，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广东

* 谭正龙，湘乡人，军统勤杂人员，抗战时期曾多次与国、共、伪三方高层人士接触。

人？你怎么懂广东话？”还问我在这里干什么？家里有多少租？我回答：“我家里没有田地，小时候讨饭。1937年在第四军九十师五三七团二营给营长杨兴华当勤务兵，他是广东人，在一起久了就懂广东话了。现在这里的被服库当库丁。”回库房后，裴耀庭叫裁缝连夜赶制了两套白细布的衬衣送去。事后我一打听，原来这位先生，就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。

后来，负责警卫的少校组长和三个尉级组员，常把不到报废期限的旧衣服找我换新的，我就这样和他们混熟了，没事也能常到蒋家院子去玩。有时候还和警卫一道陪叶先生打麻将、下棋。

叶先生的伙食，早餐吃粥和花卷、几小碟油炸黄豆、豆腐干丁、酱萝卜、大蒜丝等，午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。他最喜欢吃牛肉，也饮少量的酒。

叶先生每天都要看报纸，警卫组长每天都要到督察室接一份《中央日报》给他送去，他有时看了发脾气，把报纸掷在地上，隔一会又捡起来再看下去。

有一次，我正在警卫室聊天，侯中祥陪着戴笠来了，警卫组长赶忙向叶先生通报。戴笠走进去，站在门口敬礼。叶先生在里面拍着桌子大声责问：“雨农（戴笠的别号）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见蒋先生？为什么把我扣押在这里？”停了好一阵儿，才喊戴笠进去，大约十多分钟就出来了。叶先生两手捧着茶杯站在堂屋门外的台阶上，朝戴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有几次，从香港来了一个年约三十上下的妇女，广东人，据说是叶先生的家眷，住在五灵关街道后一栋四合院的茅房里。室内装有木板护壁，隔壁住着技术室一个姓张的湖北人在搞窃听录音。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个电工。

每当这个女人来时，总是用戴笠上山时坐的那乘藤轿子把叶先生在夜晚接下山去会面，在那里住上一两天又在夜晚送回

蒋家院子。

诱捕土匪卢麻一

1935年，国民党九十师被红军牵着鼻子拖得精疲力竭后，回到贵阳休息了几天，便开到青岩县的扁担山去围剿贵州土匪“四大天王”之一的卢麻一。

卢麻一极为凶悍，集众约三千人，盘踞在扁担山半山腰一个洞口狭小、洞内宽阔、只有一条险峻小道攀登上来的石洞里。他们经常下山打家劫舍，奸淫烧掠，群众极端痛恨，官府奈何不得。

九十师到达扁担山后，首先用迫击炮朝洞口猛烈轰击，打了一天不见动静，立即改变策略，将山团团包围，严密封锁，派人招抚。几经周折，卢匪同意招安，达成协议：全股人枪编为保安队并给卢麻一个什么“司令”的头衔；由贵州省府发给服装，旧枪改换新枪；部队移驻贵阳近郊指定地点受编。

受编时，贵州省府有预谋、有计划地在贵阳市内的公园和体育场内摆了一次“鸿门宴”，宴请受编匪军的大小头目。九十师挑选了一些武术教官和武本能手装成陪客和招待员。卢麻一也把几百名喽罗，化装为农民、商人混进城来。他本人头上戴着一顶青布大头巾，身穿白纽扣青布箭衣，腰配两只乌亮的快慢机手枪，骑在大马上，前呼后拥在爆竹声中迎进城来，俨然像戏剧里的“大响马”。

入席后，名绅富贾和贵阳名妓频频劝酒。正在狂欢痛饮的时候，九十师一举将其擒获，同时全城戒严，搜捕混进来的土匪。城外的匪军也一并被剿。

卢麻一被捕后，贵阳近郊及安顺等地前来控诉的受害群众络绎不绝。军事法庭判处了这一长期为害贵州人民的惯匪巨盗死刑，枪决在贵阳洪城门外的螺丝山下，尸体被围观群众砸得

稀巴烂。

重庆大隧道窒息事件

1940年5月底，日本飞机疯狂轰炸重庆，每天大队、小队的轮番在市区扫射投弹。5月31日达三百架次之多，一连三昼夜没有解除警报。

那时候，国民党的空军不仅没有力量起飞歼击，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极为有限，使得许多地方成了火海和瓦砾堆。虽然市民和军政机关有些疏散下乡，但仍有一大部分留在城里，每天吃过早饭就忙于进防空洞躲空袭。

市中心的较场口，有一个两公尺宽、两公尺多高，结构如煤矿坑道，可容纳近万人的长隧道防空洞。一天上午，这个隧道的进出口外突然中弹爆炸，气浪朝洞内压缩，引起洞内一阵混乱。又因为洞口装有粗木栅门，慌乱中一时打不开锁，造成洞口堵塞无法通风，乃至几千人窒息毙命。军统外语班有三十多个学员也死在里面。

当天下午，解除警报后，我奉派率清洁班赶往出事地点收尸。走进洞内，在电灯照明下只见到处都是东倒西歪、横七竖八的尸体。有的妇女抱着孩子，有的两人搂在一起，也有全家老小死在一堆的，真是惨不忍睹。各单位收尸的工人，有的抬，有的背，我用绳索套住死者的脖子一个一个的拖出洞。洞门外，人山人海，哀号哭泣震天撼地。一群宪兵和警察在维持秩序，各单位派来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查看死者的“国民身份证”、证章、符号。同时将死者姓名登记并写在白布条上挂到尸体衣襟上。高音喇叭也在次第呼喊死者姓名。死者的金银首饰、现钞及贵重物品登记检收在箩筐里缴交国库。据说是作死者的掩埋费用。登记后的尸体，都用汽车运往郊外掩埋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装运完毕。

戴笠生活点滴

1940年我调到重庆瓷器口乡下办事处后，分派到杨家山戴笠公馆挑水。故对这位军统头子的生活略有所知，现在回忆于下：

杨家山戴公馆，是一栋一排五间的平房，只有中间堂屋一道门出进。进去左手边第一间是会客室，第二间是戴笠的办公室和寝室。右手边第一间是休息室，第二间是浴室。浴室后面是锅炉房，锅炉房外有两个滤水缸和两个存水缸，戴笠有每天洗澡的习惯。

这栋房子的右侧，通过走廊有一间单独的餐室，戴笠平常就在这里就餐。他不吸烟，但饮少量的酒，日常吃饭也只四菜一汤，他喜欢吃韭菜，也常吃海带炖排骨汤。

餐室后面又有一楼一排五间的平房，第一间住着女佣人，第二间是便衣警卫的住房，每天不分昼夜都有一个便衣警卫在戴笠住房台阶上值班巡弋。第三间是勤务兵常裕民的住房，第四间是厨师的住室，第五间是厨房。这栋平房后面，有一米高的石墈，几级磴道通向一楼一连五间的两层楼房，楼下的房子空着，楼上中间梯道的左侧第一间住着一个年轻的女护士，第二间是药房。戴笠有慢性鼻炎，经常流鼻水，护士每天要为他准备十几条手帕，放在戴的口袋里，每条手帕只用一次就丢了。右手边第一间是花匠的住室，第二间是库房。花匠是戴笠的小同乡，也是戴的管家。库房里一排排的架子上摆着大大小小分类编号的箱子。箱子里有的装着各种不同料子和不同式样的衣服（戴笠经常穿藏青色的中山装，很少穿军服）；有的装着贵重的药品，如高丽参、鹿茸、熊胆、麝香等（戴笠晚间办公时，用高丽参水做饮料）；有的装着金条、首饰、古玩字画、名牌烟酒、山珍海味，以及从国外进口的各种日常用品。

戴笠大都是下午偕同女秘书余某来到这里办公，批阅文件时，戴笠往往躺在沙发上或床上，由余秘书逐件念给他听，口授批示，盖上戴的图章，戴笠亲自批阅的文件则用签名。

这栋公馆里除专用有线电话外，还安装了一部无线电话机。

戴笠喜看京剧，所以晚会上常常演出京剧，演出地点先在罗家湾，后来改在中美合作所的大会场，这里还常常举行舞会。军统内部有一个京剧团，有个叫熊普的坤角是总务处的会计，长沙人，有一次她唱《贵妃醉酒》很受戴的赏识，结果做了不定期的“老板娘”（军统内部称戴笠为“老板”），升充少校股长。湖南人在军统做事的犯了错误，求她和余秘书向戴说情蛮奏效。有个在总务处当股长的湘乡人叫曾震威，贪污被关起了，是我利用为余秘书的母亲余老太太挑水的关系，求余秘书说情放出来的。真是“英雄难过美人关”。

戴笠每个星期一都要举行周会（纪念孙中山），凡属军统管辖的大小机关主管都要参加，站着听戴讲话，有时长达三、四个小时。

独特的“明正典刑”

1941年军统有一部卡车，开到浙江金华去装运戴笠的生活用品，军统大小头目，利用沿途检查站不敢轻易过问这辆“御用车”的大好机会，大带私货从中牟利。这辆车的司机本人也神气十足，乘机夹带私货，不料回程路过贵阳时，与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站发生了摩擦，大吵大闹了一番。检查站表面让了他，结果暗中向戴笠告了密。

事发后，牵涉到好几个处长、科长、股长。他们为了丢卒保车，嘱咐司机一人承担责任，许诺设法保释。实际上他们最害怕把事情张扬出去，一旦大老板（蒋介石）知道了就麻烦

了，于是便迫不及待地杀人灭口。一天，总务处长派我带几个清洁兵抬具棺材放到菜园坝的两路口弯道边，只见两个戴礼帽的便衣早已在那里等候，一会儿，一辆卡车停下来了，被扣押的司机从车上下来，驾驶室里有个人伸出头喊：“你回家去吧！”话音刚落，便衣朝其身后开了两枪，我们立即把尸体装进棺木，抬上卡车开到洪炉厂公墓掩埋了事。

又有一次，云南检查站一个姓林的上校站长，因贪污押解重庆。有一天侯中祥叫我派几个兵夫，抬具棺材到公墓等待。一会儿，两个司法处的法官陪着这个姓林的来到守墓人洪亮的外室，屋里摆了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椅子。室外十多米处有两个便衣坐在石凳上用书本遮着脸，装做看书的样子。法官等入室坐定后，一个法官打开公文包对林说：“你的案子，大老板（军统内部称蒋介石为大老板）批下来了！你有什么要说的和告诉家里人的可以写信。”林听后嚎啕大哭，无法成书。法官劝他到门外散散步。林刚走过便衣坐处，有个便衣朝他身后开了枪，林应声倒地，便衣走近又开了一枪。另一便衣取出照相机翻转尸体照了像，最后由我把尸体装进棺材掩埋，军统就是这样处决人犯的。

巡官与扒手

1948年，我经军统人员侯中祥当面介绍给潘其武，然后再经潘介绍到他的学生郑长勋（自江南铁路警务处处长）那里当了一名一等警长，具体安排在南京中华门派出所服务，每天带班在车站上维持秩序。

江南铁路是南京到安徽芜湖的一条铁路。警务处直属交通警察总局，配备有一个警察中队，管辖中华门、当涂、芜湖三个派出所。一个班随车执勤，一个便衣组搜索情报。

我初次执勤，发现一个穿西服戴墨镜的中年男人，在开票

时来到车站。站在购票旅客的队列外，有时也插到购票队伍中，友善地拍着旅客的肩膀嘱咐其小心扒手。由于他连续几次在售票时出现，所以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。他果真是个扒手，一次，他正在进行扒窃时，被我当场抓获，引起了许多旅客围拢来打骂。这时派出所的刘巡官跑来了，声称带到所里去。列车开后，扒手跟着放了出来，我气愤地和刘巡官吵了起来。

下班后，刘巡官笑嘻嘻的邀我去坐茶馆。一个年约三十上下的男子走上前来殷勤招待。据刘巡官介绍他是“青帮”里的小头目。他恳切地请求我今后对他的小兄弟们（扒手）多加照顾，同时交待茶馆老板，今后我进馆喝茶，吃点心都记在他的帐上。还强拉我到服装店做了一套卡叽便服，再后还不断地献殷勤。

我从他那里了解到，当地的扒手还划分了势力范围的，黑话称在当地“作业”的为“顿差”，外面流来的叫“流水”，分赃叫“开花”。衣着上也有不同的标记。

有一次，某部队的军需到南京领款，在中华门车站被扒，交警总局限期破案。我去找那个小头目交涉，他说：“是我们干的，款未开花，你放心好啦。”当天，一辆轿车开到了郑长勋公馆，走下一个穿着很阔气、年约五十的男人，承认全部退赃，但不交人。这样，我才明白国民党的警务处与扒手原来是串通一气的，扒手也是受警察保护的。

周佛海等人在“白公馆”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我被派回重庆被服库工作。约在9月底，戴笠从上海把一批日伪政权台柱人物秘密送到重庆“白公馆”看管。计有：

周佛海（沅陵人），汪（精卫）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、伪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、

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审议委员兼秘书长、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兼秘书长、伪军事委员会副会长、伪税警团总团长、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、警察局长。

丁默村（常德人），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、伪军事委员会委员、伪社会部部长、伪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主任、伪浙江省省长。

罗君强（湘乡人），汪伪政府边疆委员会委员长、伪司法行政部部长、伪税警总团总团长（原为周佛海兼任）、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兼警察局副局长。

杨惺华（湘潭人），汪伪政府财政部总务司司长、伪中央信托公司经理。

马骥良（江苏常州人），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长。

周佛海还带着老婆杨淑慧、儿子周幼海、副官张福生（河北人）、李保和（南京人）、看护马小姐（江苏无锡人）、女佣人等。

军统派工程处监工员魏孔（山西人，兰州培训班学员）担任管理员，并派了勤务和厨师二人。

不久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揭露了这一秘密，舆论大哗，魏孔以泄漏机密嫌疑犯被捕。军统总务处的侯中祥指定我接替魏孔，并亲自带我到“白公馆”向周佛海等交代说：“现在找了一位你们的同乡来招护你，先生们有什么要办的事，想吃什么东西，都可以找他，只要我们办得到的一定照办。”

“白公馆”座落在重庆歌乐山，朝向嘉陵江的半山腰，原是川军一位姓白的师长的别墅，一栋明三暗六的二层楼房。屋后悬崖陡壁，两侧和正面筑有围墙，围着一个不太大的庭院，掩映在茂林深处。槽门经常虚掩着，一个哨兵在院子外游弋。

悬岩右上首一栋平房驻扎警卫队，可以俯视院内的一切。院内左侧有一栋平房，一间厨房，其余房间住着勤务兵、厨师和周的两个副官。厨师叫汤春生，湖北人，原是军统局本部食堂的大师傅。他的副手叫沈少钦，是我的小同乡——湘乡县泉塘乡山坳村人。杨淑慧有时也进厨房做些周佛海喜爱的菜。

正屋楼下的中间厅堂是餐室，右边前室杨惺华住着，我住在他的后房。左边前室马骥良住着，罗君强住在后室。楼上中厅是起坐间，右边前室周佛海夫妇住着，护士马小姐住在他的后室。左边前室丁默村住着，周的女佣人住在后室。站在楼的走廊上，可以瞰眺嘉陵江上和歌乐山下的景色。

我每天除到财会室领款派沈少钦采办蔬菜外，还要到警卫室接取《中央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及专为周佛海订的英文报等报纸。晚上向侯中祥汇报并听取指示。侯交待伙食实报实销，不受限制，尽可能办好，有些副食品从上海寄来，周佛海抽的雪茄烟还是从香港空运来的。我还化名“甘成卓”与杨惺华在上海西爱司路382号的家属联系，为他们在陈家桥邮局的大众信箱发送、接取信件。

由于侯中祥的一再交待要妥善照料，客气对待，加以我和他们还有同乡关系，所以相处融洽，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摆龙门阵。

周佛海虽然老成持重，有时候也谈过去的事，并竭力为自己辩解。我记得他讲过，他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宣传部长，由于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估计不同，所以跟着汪精卫走另一条“想救国”的路。1942年冬，就和戴先生取得联系，供给军事情报，营救掩护中央在日军占领区工作人员，设立电台，协助中央发展沦陷区党务文化。日本投降后，被中央任为上海行动总队长，遵中央旨意，维护沪杭一带治安，国军与中央接收人员先后抵沪后，即将所属军、警全部交与中央接收。